

无地自由·胡适传

沈卫威
著

(增订珍藏本)



WUDIZIYOU HUSHIZHUAN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无地自由·胡适传

沈卫威 著

(增订珍藏本)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地自由：胡适传 / 沈卫威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202-10176-6

I. ①无… II. ①沈… III. ①胡适 (1891~1962)—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9802 号

书 名 无地自由：胡适传

著 者 沈卫威

责任编辑 王 静 陈冠英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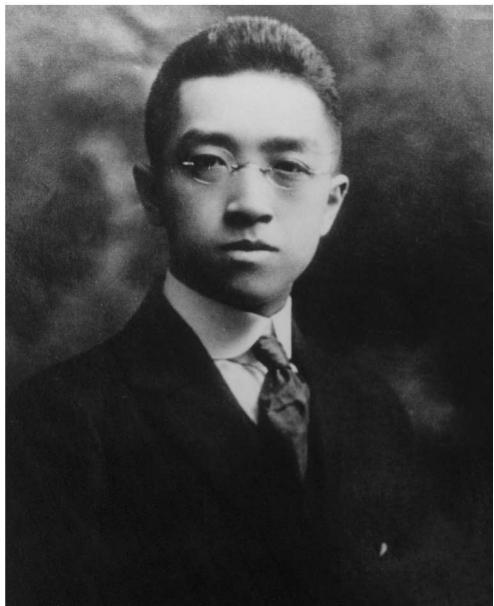
字 数 438 000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10176 - 6/K · 1144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胡 适
(1891-1962)

目 录

引子 / 1

上卷 自由主义的辉煌与困境 / 5

第一章 从徽州走向世界 / 7

第二章 自由之赐 / 57

第三章 顺风而呼 / 97

第四章 干预政治 / 159

第五章 欲越困境 / 209

下卷 自由之旅的苍茫岁月 / 277

第六章 何去何从 / 279

第七章 幽灵回荡 / 357

第八章 寂寞的狮子 / 405

附：胡适年谱简编（1891—1962） /473

后记一 /483

后记二 /485

后记三 /487

引子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晚上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那对于拿破仑成了一种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雨水，便可以使滑铁卢成为奥斯德里慈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着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世界整个崩溃。^①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当雨果作为《悲惨世界》故事的叙述者，从比利时的尼维勒到达滑铁卢附近的乌戈蒙时，在作了上述这段“假使”的同时，又不无淡淡的幽默，说道：

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的一个农民向游人说：“先生，给我三个法郎，假使您高兴，我把滑铁卢的那回事说给您听听。”^②

①（法）雨果著：《悲惨世界》（李丹译）第378—3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同上书，第378页。

由于写作《胡适传》的缘故，我多次身临传主故乡徽州。而那都是为了体认胡适晚年随国民党政府到浪花尽处，东海扬尘时所说的：“我将来写自己传记时，要一大章来写徽州的社会情形。”^①

在传主家乡绩溪，从县城到山村上庄，所到之处，随时遇见一个行人，只要他们得知我是来“寻找胡适”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向我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尽管他们话语中“胡适的故事”，有的纯属子虚乌有，有的是添枝加叶，有的是移花接木，但他们都为有胡适这位乡贤里圣而产生与你交流的话题。也许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文化功利价值，但起码是一种谈资和交流的媒介。胡适实际上成了他们向外界展示他们“文化之乡”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

就传主家乡绩溪而言，由于胡适个人沉浮之故，曾几度辉煌，几度暗淡，而今又再度展示出她的文化风光。“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一个个绩溪人向我或许多身临绩溪的外乡人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

1989年秋至1990年春那个暴风雨过后的岁月，我到长江三峡漂泊，去庐山、黄山攀登，还到井冈山去跋涉。抹不掉的烙痕，化不开的情结，我思考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使命。且因写作《茅盾传》的缘故，我得以比较了胡适、茅盾两种政治—文化不同取向的知识分子。

在那本简略的《胡适传》初版印行三年后，我第四次来到绩溪时，一位胡适的亲属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假如胡适先生1948年底不从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走掉，你的《胡适传》将是另外一个面目吧？”

正是基于不容假设的历史法则，我回答道：“如果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化史，尤其是学术思想史也会是另外一个格局。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了。”

也正是这次谈话，使我忆起了雨果《悲惨世界》里的那一个值得人们品味的假使，和那个随时可以“说给您听听”的故事的表达方式，并从中得到如下启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来说，胡适何尝不是一

^①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5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个拿破仑式的英雄(章士钊称之为“适之大帝”)^①。同时也正如普希金在《致拿破仑》一诗中所云：

神奇的功业一旦建成，
一代伟人立见凋敝。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经历了封建帝制覆灭、三民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验三个重要阶段。特别是20世纪初实验主义的呼声，20世纪末才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得到回应。这对胡适来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参与。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

作为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文化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干预政治是歧路。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是暂时的，文化却是永恒的。他留下的遗产，显然很难用政治与学术划为不相容的两极，本传则着重于胡适的“歧路”上追踪。

百年新文化，一部胡适传。

言归正传。请读者随我在对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进程的回眸中，“寻找胡适”，在胡适那“自由的感念与困境”中，以你个人的感知与理念参与胡适形象的重塑。

^① 五四前后，三位文化名人曾在撰述中因胡适而提及绩溪，使这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小县因胡适而辉煌。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中说中国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先后称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1990年代，一度所谓“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时，因红顶商人胡雪岩是绩溪人，曾引起世人对“徽商”的关注。21世纪初因绩溪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而再度全球知名。

上卷

自由主义的辉煌与困境

第一章 从徽州走向世界

对于许多人来说，胡适家乡徽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故乡，都有说不完的故事，理不清的感情头绪。昔日晋王武子与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曰：“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上卷上 德行第一）

胡适家乡，有着更诱人的东西。

—

长江自西向东将安徽省切割为皖南皖北两部分。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曾感叹皖北自朱元璋到李鸿章，“惟产英雄，不产学者”。皖南皖北文化地域不同，“风气固殊”。

地邻江、浙、赣的徽州府，西依黄山，腹含新安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徽州全区都是山地，土地贫瘠，耕地甚少，昔日全年的粮食仅够当地居民三月之用，在这种



上庄风光 谈志华摄

自然环境下，为了生存，他们就开拓出两条生计之路：一是利用山地种茶，制漆，制墨；二是脱离农村外出经商。二者相辅相成。前者导致徽茶、徽墨驰名海内外，后者使地域经济发展，导致闭塞的山区较早开化。一千多年来徽州人以善经商而闻名，足迹遍及全国，他们多从事茶叶、笔墨、食盐、当铺四业，小本起手，发家致富。因此有了与“无湘不成军”并称的“无徽不成镇”之说，意指一个地方只要徽州人进来，就开始立店铺，做生意，使乡村变为小市镇。以至于在1990年代有“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的民间流言。而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绩溪人。

流行的“徽墨”、“祁红屯绿”（茶）等名优产品为徽商争光，而“徽州盐商”、“徽州朝奉”（当铺的管事人）则含刻薄讽刺之意。又有“徽帮”之说，史书说它因徽州“地濒新安江之上游，又当黄山之阴，田谷稀少，不敷事畜，于是相率服贾四方，凡典铺、钱庄、茶、漆、茶馆等业皆名之曰‘徽帮’。

敦尚信义，有声商市”^①。

自南宋以下，江南都市经济文化繁荣，尤其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之后，徽州商人得天时地利之便，所产茶、墨、漆、砚、竹木、药材，或顺新安江之流而去首都，或经芜湖沿长江上下武汉、南京。加上宋代特殊的社会政治，商人为求得社会地位而纷纷入官场或转治学术，官、商、士互相利用，导致士商合流，豪杰之士多出于商贾。士、商、工、农四民不分，名士大儒多出于商贾，在徽州明清两代尤为明显，他们彼此有交通，相互利用。至于为士者多悭吝，为商者敦信古谊，在徽州也是事实。所以说，从文化精神上看，他们共同为徽州的商品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建设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同时，要达到“四民不分”，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不单是“学而优则仕”，或“仕而困则商”。联系四民心理，维系其意念平衡的是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价值取向。因此才有“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于缝章而后为士也”^②的现象，和“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③的事实。也就在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时尚的大背景下，徽州出了乡贤圣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并有相应的“新儒学”诞生。

宋明理学在徽州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徽州文化中有着程朱理学最集中的体现。朱熹继承了二程兄弟“穷理便尽性”，性中自有理，性即是理的思想，建立起他自己人性论和禁欲主义的伦理学说。越到后来，朱子之学越成为徽州人的文化精神象征，书生之家供朱子为祖师。因此，朱子理学——“新儒学”伦理便成了徽州人的精神依托和信奉的天理。连胡适家乡绩溪也“自朱子以后，多明义理之学”。“风之所渐，田野小民亦皆知耻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三，转引自李敖：《胡适评传》第1册第103页，台湾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0页，黄山书社1985年版。

^③ 同上书，第438页。

畏义”。徽州一跃成为“东南邹鲁”“文化之乡”。

徽州的商品经济，是与朱子“新儒学”同时起步的。朱子“新儒学”伦理在后来如日中天，徽州的商品经济也相应地出现了繁荣。前者又十分投机地融汇进了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徽商对朱子“新儒学”伦理文化的认同、改造，使得徽州由单一的商人文化，向多元文化发展，即资本的积累、转化——向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建筑投资（与优美的房舍、祠堂相应的还有无数各式各样的牌坊），进而促进徽州文化的全面繁荣。

经商谋生是一项艰辛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少小离家，历尽艰险，以求发家致富。他们通常在十一二岁时便到城里学做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直到20岁以后可以独当一面时，方可结婚成家，然后又向更远的地方谋生。“徽骆驼”“绩溪牛”的得名，便是这种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开拓、创业精神的体现。“徽帮”的商业意识使人富于进取，群体意识使人团结，但同时也形成了保守的乡党观念。在性格机制上，常呈现出进取与保守的矛盾统一体。

—

“徽帮”出入带来明清两代徽州地域经济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商业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这种特殊的文化地理因素，使徽州学术自成一派，且卓有成就。此乃司马迁所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孰而益彰者乎？”^① 司马迁认识到“孔子名扬于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得力于子贡的经济资助。而徽州学术的兴盛与发展，自然是得力于徽商的经济后盾。胡适认为这是“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②。

^① 司马迁：《史记》第325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胡适全集》第18卷第15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上庄乡街景 谈志华摄